

凤凰咏：中央乐团1956-1996（套装上下册）（附CD光盘1张）



[凤凰咏：中央乐团1956-1996（套装上下册）（附CD光盘1张）_下载链接1_](#)

著者:周光蓁 著

[凤凰咏：中央乐团1956-1996（套装上下册）（附CD光盘1张）_下载链接1_](#)

标签

评论

好书，200-100叠加中华专场，很给力

好评好评好评好评好评好评

中央乐团的历史，是新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一个样板，一个地标性的点。

作为中央一乐团的粉丝，了解一下它的历史，不错

给老爸买的，还不错送货快

向往已久，非常值得收藏！

书和购物体验都很不错！

送货及时，东西也好。

非常满意，五星

还不错，之前看过港版的。这次想看看大陆版啥样，印刷质量稍显薄弱，纸质较差，开本也比较小，所以图片都不大。

历史书籍一套，这个圈出来混得知己知彼才有可能不被弄死

好。 。

“历史”之外的记忆

十年之前，我从兰州前往黄河上游的炳灵寺石窟，沿着盘山路，自行车骑到永靖县的刘家峡码头。在这里，我要搭乘快艇横渡著名的刘家峡水库，才能溯黄河而上，来到炳灵寺石窟。第一次见到刘家峡水库的我，被这万顷碧波感动，盛夏时节，身在西北高原，却有环湖碧绿满山。快艇激起的水花，带来沁心凉意，催走了适才傲人的暑气。在这湖地洞天中破浪二十多分钟，尚未涤尽千尺湖水，亲水岸边的炳灵寺码头已在眼前，码头背后就是石窟庄严。

后来者看到的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，而一切过往，以及万顷碧波之下的记忆，或许只有黄河岸边伫立了15个世纪多的大佛才一一记得。20年前，人类学家景军来到了刘家峡下游不远盐锅峡的大川村，从村里定居的孔家人那里，他发现了已在水面之下曾经的大川村，以及宽阔、舒缓河面边缘一片废墟中的孔庙。通过孔家人对1960年代以来各种往事的回忆，重建了水下村落与重建大川之间的脉络，一座消失的孔庙渐渐从水边慢慢浮现。在英文版、网络流传中译版相继流行十多年后，这段往事终于以中文版——《神堂记忆：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、权力与道德》呈现在我们面前了。

虽然姗姗来迟，但景军在书中，批判性采用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·涂尔干弟子兼同事莫里斯·哈布瓦赫提出的“集体记忆”概念还是会给初读者留下深刻印象——“研究在家庭、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，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……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、社区、宗教、政治组织、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”。作为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之一，哈布瓦赫承认“集体记忆”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同时，指出“个体记忆”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属性，正是这种多元叙事的存在，赋予了个体具体的行为实践。因此，在此项研究中，景军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，重建了与主流“历史”不尽相同的“社会记忆”。

首次知道此书是在某网站搜"中央乐团"四个字时无意中发现的.那一版本也是三联版的,但因为只能见到封面,无法见到内页,而封面上的字体均为繁体字,故不知内文用字为繁体或简体.这一版的书名为<中央乐团史1956--1996>,另在书的腰封上以繁体大字标示:中华首个国家交响乐团集体传说.封面完全被一张黑白照片所占据.当时我便看上了此书,只是由于价格原因未能将其买下.同样是在无意的情况下,也是无意中搜"中央乐团",竟意外地发现了三联的现在这一版本,只是书名变为了<凤凰咏---中央乐团1956---1996>.这一版本分为上、下两册,其中上册是乐团的成长史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坎坷经历;下册则以图版为主,约占下册的三分之二篇幅,另三分之一为附录1--附录6,其中附录1至附录5分别为乐团40年期间的大事记,演出一览表,演职员表,录音一览表和外国交响乐队访华一览表,此外另有40年间CD唱片---解说,所有这些极具史料及文献价值.下册的主体---图版部分则是演出剧照,海报以及各类节目单,包括中外的,新的与老的,早期报纸上那种比较简陋的和折页式的,还有唱片封套照片以及刊载有乐团活动消息的报影,所有这些,同样是不可多得资料.繁体版本则为全一册.从书的侧影看,内页部分中,间或有不少铜版纸穿插其间,估计(只是估计)那上面印的就是下册中的图版部分.只是将上下二册合为一册了.所以,新版与繁体字版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.其实我觉得新版还是不分册的好,将现在下册的图版部分分散在上册中,使人看着不但有图文并茂的感觉,在版面上也显得活泼一些.现在的下册三分之二为图版,这就不由得使人觉得似乎好像在凑数一般(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).书的印刷也很好,内文用纸光洁细腻,这就保证了照片部分异常清晰.两点小遗憾:1,照片用纸不是铜版纸;2,所有照片均为黑白照.除此之外,均好.最后说一下装订的问题.我收到的两本书整体还行,只是上册有些"小"问题:当我把书摆在水平面上时,我从书的左下角方向俯看书脊这一平面,便会发现书脊这一"面"并不在同一平面中,如果想使其处于同一平面中时,则须用右手捏住书的右下角,大拇指稍用力向前轻推,这时书脊这一面才会处在同一平面中.但此时封面的右上角不但会鼓起来,而且整本书则在水平方向上不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中了.也就是说封面这一平面与书脊这一平面,两个平面相互不能垂直.此现象在木工的行话里应叫做"角楞".另外,封面左侧有数个横向的起伏纵贯上下,不甚平整,是为装订之原因.再有就是胶太薄,当书页从中间打开时,书脊已呈圆弧状,此无疑为一缺陷.

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,有许多以前不了解、不知道,也没有人写的事情。

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,赫德乐队、工部局乐团、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。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,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,因为人才太少。至重庆时期,有了三支乐队,分别由吴伯超、郑志声、马思聪任指挥。

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,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,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,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。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“少林寺”。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,张贞黼、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,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,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。张身着燕尾服,演法国调,让马歇尔大感惊讶。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,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。

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,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,当然是华人音乐家的翘楚。谭抒真写过一篇《难忘1949》中说到,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的问题,谭认为,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,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,则应在张贞黼、李德伦中选择。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,去世时只有43岁。

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。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,但很少

有人写文章说此事。大概是为尊者讳吧。《中央乐团史》的作者说，吕骥认为“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，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，不以器乐为主，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。”但贺绿汀就认为，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，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。贺绿汀返回了上海，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。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，早在延安时期，他已与“极左派”白热化了，“他们说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，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，我下决心不在那里，到部队去。”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，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。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，写出来就是历史，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，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，少有互相印证的话，就不是历史了，是八卦。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，节目里说，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，认为歪曲了历史，作者来自辩，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，没一处是作者臆断，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。书很厚，还没有看完，陆续看了几段。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，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，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，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。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，他现在反省，认为当时与吴祖强、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，不见得正确。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，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，不应该轻易改掉。中央乐团改国交后，将合唱团甩掉，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，直至陈佐湟离职。历史经验证明，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，国交成立十多年，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，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，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。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。如刘靖之的《中国新音乐史论》，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，关于争议编成了书，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。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、学校开大会，就觉得这很后现代，很行为艺术，看到文革中，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，是性冲动的原因。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？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？当然理解不了。这本书很大很厚，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，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。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、没人出、没人买，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（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《一阵风，留下千古绝唱》时，书店老板羡慕地说，我们香港人没文化，不看这种书。）单从这点上说，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。

前幾天拿到了《中央樂團史》，粗粗地翻了一下。這本書寫了中央樂團從1956年到1996年的歷史，有許多以前不了解、不知道，也沒有人寫的事情。引言是管弦樂團在中國的起源與發展，赫德樂隊、工部局樂團、哈爾濱交響樂團是在中國最早出現的三支洋樂隊。上海淪陷前蕭友梅與黃自都曾為組織一支中國的樂隊努力，但幾乎沒有什麼演出，因為人才太少。至重慶時期，有了三支樂隊，分別由吳伯超、鄭志聲、馬思聰任指揮。吳伯超在重慶和常州辦的國立音樂院幼年班，為後來的中央樂團打下基礎，直至1996年中央樂團改稱中國交響樂團前，那些幼年班的學員仍有不少在中央樂團效力。作者稱這個幼年班為樂界“少林寺”。中央樂團是在1946年的延安創辦的，張貞黼、李德倫當時都在延安，要建立這個樂團是因為馬歇爾訪延安時，張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國舞曲。張身著燕尾服，演法國調，讓馬歇爾大感驚訝。周恩來等見洋樂有如此功效，即當場拍板建立中央樂團。值得一說的是張貞黼，他是1930年代參加工部局樂團的四人之一，當然是華人音樂家的翹楚。譚抒真寫過一篇《難忘1949》中說到，為新中國的上海音樂界選取領導人選的問題，譚認為，賀綠汀是音專院長的合適人選，上海工部局樂團的團長，則應在張貞黼、李德倫中選擇。但當過中央樂團副團長的張貞黼1948年就去世了，去世時只有43歲。緒論中還談到呂驥與賀綠汀的土洋之爭。這大概是個過去音樂界人人知道的事，但很少有人寫文章說此事。大概為尊者諱吧。《中央樂團史》的作者說，呂驥認為“以鋼琴

提琴为主要的时代已过去了，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，不以器乐为主，尤其不能以西方的钢琴提琴为主。”但贺绿汀就认为，无原则地反对西方音乐和西方乐器，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。贺绿汀返回了上海，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。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，早在延安时期，他已与“极左派”白热化了，“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，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，我下决心不在那里，到部队去。”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，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。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，写出来就是历史，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，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，少有互相印证的话，就不是历史了，是八卦。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，节目里说，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，认为歪曲了历史，作者来自辩，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，没一处是作者臆断，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。书很厚，还没有看完，陆续看了几段。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，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，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，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。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，他现在反省，认为当时与吴祖强、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，不见得正确。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，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，不应该轻易改掉。中央乐团改国交后，将合唱团甩掉，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，直至陈佐湟离职。历史经验证明，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，国交成立十多年，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，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，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。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。如刘靖之的《中国新音乐史论》，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，关于争议编成了书，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。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、学校开大会，就觉得这很后现代，很行为艺术，看到文革中，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，是性冲动的原因。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？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？当然理解不了。这本书很大很厚，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，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。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、没人出、没人买，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（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《一阵风，留下千古绝唱》时，书店老板羡慕地说，我们香港人没文化，不看这种书。）单从这点上说，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。

很早就买了香港版。没想到大陆也出版了。很好很好。

书中的观点不一定对，现很有意思。

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，有许多以前不了解、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写的事情。

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，赫德乐队、工部局乐团、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。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，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，因为人才太少。至重庆时期，有了三支乐队，分别由吴伯超、郑志声、马思聪任指挥。

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，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，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，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。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“少林寺”。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，张贞黼、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，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，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。张身着燕尾服，演法国调，让马歇尔大感惊讶。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，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。

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，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，当然是华人音乐家的翘楚。谭抒真写过一篇《难忘1949》中说到，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的问题，谭认为，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，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，则应在张贞黼、李德伦中选择。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，去世时只有43岁。

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。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，但很少

有人写文章说此事。大概是为尊者讳吧。《中央乐团史》的作者说，吕骥认为“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，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，不以器乐为主，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。”但贺绿汀就认为，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，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。贺绿汀返回了上海，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。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，早在延安时期，他已与“极左派”白热化了，“他们说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，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，我下决心不在那里，到部队去。”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，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。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，写出来就是历史，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，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，少有互相印证的话，就不是历史了，是八卦。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，节目里说，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，认为歪曲了历史，作者来自辩，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，没一处是作者臆断，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。书很厚，还没有看完，陆续看了几段。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，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，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，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。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，他现在反省，认为当时与吴祖强、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，不见得正确。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，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，不应该轻易改掉。中央乐团改国交后，将合唱团甩掉，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，直至陈佐湟离职。历史经验证明，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，国交成立十多年，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，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，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。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。如刘靖之的《中国新音乐史论》，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，关于争议编成了书，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。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、学校开大会，就觉得这很后现代，很行为艺术，看到文革中，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，是性冲动的原因。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？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？当然理解不了。这本书很大很厚，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，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。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、没人出、没人买，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（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《一阵风，留下千古绝唱》时，书店老板羡慕地说，我们香港人没文化，不看这种书。）单从这点上说，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。

[凤凰咏：中央乐团1956-1996（套装上下册）（附CD光盘1张）_下载链接1_](#)

书评

[凤凰咏：中央乐团1956-1996（套装上下册）（附CD光盘1张）_下载链接1_](#)